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与 城市发展关系研究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ese World Heritage
Tourism and City Development

闫 颖 张广海 ◎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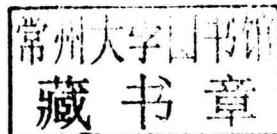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CHINA OCEAN UNIVERSITY PRESS

国家旅游局资助项目成果(861605050009)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 关系研究

闫 颖 张广海 著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 青岛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研究/闫颖,
张广海著. —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2016. 5

ISBN 978-7-5670-1160-1

I. ①中… II. ①闫… ②张… III. ①文化遗产—旅游资源开发—关系—城市建设—研究—中国 IV. ①F592
② F29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0239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青岛市香港东路 23 号 邮政编码 266071
出 版 人 杨立敏
网 址 <http://www.ouc-press.com>
电子信箱 zhaochong1225@163.com
订购电话 0532-82032573 (传真)
策划编辑 韩玉堂
责任编辑 赵一冲 电 话 0532-85902495
印 制 蓬莱利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5.5
字 数 254 千
印 数 1—1000
定 价 2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联系 0535-5651533 调换

前言



中国已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30年,至2015年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全球第二,分布于全国62处。2015年中国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中后期。世界遗产作为城市空间中的珍贵资源,成为城市发展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自1987年我国第一批世界遗产诞生,从总体上看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一直保持攀升的态势。在中国旅游业高速发展的今天,围绕全人类共同财富的世界遗产进行的旅游在激发经济增长活力、促进城市的建设与发展、提升城市人民生活质量等方面的作用备受关注。中国政府高度重视世界遗产旅游的地位和作用,正为实现将世界遗产旅游打造成中国旅游业中的重要链环和人民群众更加满意的现代服务业的目标而努力。

本书的基本内容是围绕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关系的研究。研究依据旅游学、城市发展学、经济地理学等相关理论与方法,按照“内涵—特征—机理—测度—评价—路径”的研究思路,构建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评价体系,对近十几年中国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水平进行测度并对其时间演变和空间差异进行分析,在确定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动力机制后,建立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协调度评价模型,对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度进行评价与分析,并通过聚类分析总结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的类型以及相应的发展路径。以此作为我国协调遗产地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理论支撑和实践研究基础。

本书的撰写正值我攻读博士的阶段。首先要衷心感谢我的恩师张广海教授,是张教授给了我难得的学习机会,并在本书的选题、多次修改中对我进行悉心指导。张广海教授无论是在学习、科研上,还是在做人上都给我很多

启发,他严谨的治学精神、深厚的学术造诣让我受益匪浅。其次要感谢攻读博士期间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和各位同学,朝夕相处中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有欢笑也有泪水,我相信这是我们一辈子的缘分。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家人,你们永远是我最温暖的港湾和最坚强的后盾。本书的撰写完成并不意味着我对遗产旅游与区域发展关系研究的结束,它更是我继续深入研究的起点。

管理学院 320 室

2016 年 6 月 20 日

目 录

CONTENTS



第1章 绪论	1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1
二、研究目的与价值	6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7
四、研究思路与方法	27
五、创新点	30
第2章 世界遗产地旅游与城市发展的概念与相关理论研究	32
一、世界遗产旅游的相关概念	32
二、城市的相关概念	41
三、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的特征	44
四、相关理论	54
五、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国际经验借鉴	61
第3章 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现状分析	73
一、世界遗产总体情况	73
二、世界遗产的数量与分布	84
三、中国世界遗产旅游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100
四、中国世界遗产地城市的发展状况	108
第4章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相互作用机理分析	117
一、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相互作用的影响因素	117
二、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相互作用的逻辑结构	117
三、世界遗产旅游的经济功能与城市发展	118

四、世界遗产旅游的社会文化功能与城市发展	123
五、世界遗产旅游的环境功能与城市发展	133
六、城市发展对世界遗产旅游的反作用	143
第5章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水平的测度与评价	145
一、世界遗产旅游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与方法	145
二、世界遗产旅游发展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	151
三、世界遗产旅游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155
四、世界遗产地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与方法	162
五、世界遗产地城市发展构成要素的变化趋势	166
六、世界遗产地城市发展水平的时空演变	174
第6章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评价与类型划分	181
一、世界遗产旅游发展与城市发展的关联度分析	181
二、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关系的面板数据模型分析	183
三、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关系的耦合协调模型分析	187
四、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协调类型分析	196
第7章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与城镇发展相互关系的实证分析 ——以曲阜为例	199
一、世界遗产地城镇曲阜现状	199
二、“三孔”世界遗产价值分析	200
三、世界遗产旅游与城镇发展水平测度	203
四、世界遗产地旅游与城镇发展关系评价	209
第8章 中国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的路径分析	213
一、良性协调型世界遗产地发展路径	213
二、初步协调型世界遗产地发展路径	216
三、低度协调型世界遗产地发展路径	221
第9章 结语	225
一、主要研究结论	225
二、不足之处与进一步研究的方向	226
参考文献	227

第1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 世界遗产资源及其旅游价值

世界遗产数量不断增加。从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十七届会议通过《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开始,截至2015年第39届世界遗产大会闭幕,《世界遗产名录》共列入了1031项世界遗产,其中802项为文化遗产,197项为自然遗产,32项为文化和自然混合遗产,拥有遗产的国家数增至163个。我国于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组织,1987年拥有第一批世界遗产6项,到2015年共有48个项目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中,文化遗产34项,自然遗产10项,自然与文化混合遗产4项),世界遗产数量位居世界第二。

在旅游价值上,世界遗产具有其他旅游资源无法比拟的优越性,世界遗产具有不可替代性,还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和自然环境演化的历史遗存,是极其珍贵而不可替代的高品位旅游资源。一般旅游资源只具有地区意义,而世界遗产的旅游吸引力要更广,成为全国范围内甚至是国际范围内的旅游热点。世界遗产在资源品味及其吸引力上所表现出来的垄断性使其成为旅游开发优先选择的资源,也是世界遗产地发展旅游业最受重视和最先发展的对象,因为世界遗产本身就是遗产地最典型的旅游形象,其直接决定了世界遗产地的旅游发展水平和级别,使世界遗产地旅游业拥有起点高、潜力大的先天优势。由此可见,旅游是世界遗产价值实现的重要途

径,世界遗产也是品位最高的旅游资源。

(二) 世界遗产旅游的发展

遗产旅游作为一种世界现象已经成为人类求取与外部世界高度和谐的有效形式之一,成为高质量回归自然、回归历史的必然性的社会生活组成部分^[1]。1978年第一批世界遗产诞生,自此之后,世界遗产旅游开始被发达国家作为全新的旅游产品主题进行营销和培育。经过多年的发展,伴随着国际旅游产业向纵深化方向发展,旅游活动的高品位化趋势加强,遗产旅游已经成为发达国家主流的大众旅游类型之一。根据世界旅游组织(WTO)的预测,以世界遗产旅游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遗产旅游为例,每年文化遗产旅游者的数量占到全世界旅游人数的37%,并且其人数还在以每年15%的速度增加。若以2015年11.8亿人次的国际旅游人数估算,其中至少有4.37亿人次的旅游活动与世界文化遗产有关。由此可见,随着世界遗产项目的丰富,以世界遗产为主要吸引物的各种类型的旅游活动日益增多,各国世界遗产地接待的旅游者数量也逐渐增多。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世界遗产意识日益增强,世界遗产旅游蓬勃发展。2000年中国国家旅游局向国际旅游市场推出“神州世纪游”的年度旅游主题活动,以中国全部27项世界遗产所在地为旅游目的地和主打产品向全世界推介,这些世界遗产及其所在地纷纷成为国内外游客心驰神往的旅游首选目的地。据统计,2003年南京明孝陵“申遗”过程中,景区客流量比申报前增加了20%。申遗前明孝陵一年的客流量在80万人次左右,申遗成功后的一年里,客流量突破了100万,并仍在以每月20%的速度递增。湖北钟祥市的明显陵2000年底被列入“世界遗产”项目后,2001年一年的游客数量即是前5年的总和。2004年苏州第28届世界遗产大会的召开进一步推动了我国世界遗产旅游的发展,之后的一系列旅游统计数据也充分反映了这一历程。世界文化遗产皖南古村落——西递、宏村之一的西递村自从2000年成为世界文化遗产后才声名鹊起,2000年接待游客18.4万人次,门票收入为529.19万元,2005年接待游客43.9万人次,门票收入为1452.62万元^[2]。2011年四川省旅游总收入的90.24%来自于其境内的世界遗产所在地(四川省拥有5项世界遗产,分别是世界文化遗产“都江堰—青城山”、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峨眉山—乐山”、世界自然遗产“四川大熊猫栖息地”、“九寨沟风景名胜区”和“黄龙风景名胜区”),这一数据充分说明了世界遗产旅游在四

川旅游中的核心地位。另外,2011年旅游总收入排名前十位的旅游景区中,世界遗产旅游景区几乎占了半壁江山。其中居于首位的是世界文化景观遗产庐山,旅游总收入达到56.27亿元,居于第五位、第九位、第十位的是世界文化景观遗产五台山、世界文化遗产武当山和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黄山,旅游总收入分别是28.28亿元、18.6亿元和18.18亿元¹。从旅游资源成为世界遗产前后的数据对比中能更加清晰地发现世界遗产旅游的号召力,我们将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申遗成功前1995年的旅游数据与申遗成功后的2013年的旅游数据进行对比发现,丽江旅游总人数从1995年的84.5万人次爆增到2013年的2 079.58万人次,旅游总收入从1995年的3.26亿元增加到2013年的278.66亿元,分别增长了24.61倍和85.48倍之多。

(三) 对申报世界遗产热潮的思考

很多国家对申报世界遗产的热情不断高涨,中国也是如此。我国在加入世界遗产组织后积极参与世界遗产工作,国内民众和各级政府的世界遗产意识也日益觉醒,世界遗产由一个陌生的概念变成了家喻户晓的时尚名词,诸多景点表现出日益高涨的申报热情,而且很多纷纷开展了申报世界遗产的具体筹备工作。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固然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要列入世界遗产目录则还必须在多个方面付出努力。正是30多年来的不断努力,中国拥有世界遗产的数量迅速跃居世界第二。目前中国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中仍然有26个世界遗产项目,仅仅这些已经列入世界遗产预备名单中的项目就要至少13年才能申报完毕(2004年,世界遗产委员会出台新规定,每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2项世界遗产)。

总的说来,“申遗热”是件好事。世界遗产的多样性使我们能够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从世界文化的全新角度重新审视中华民族的文化,认识华夏文明在世界上的地位,无形中增强了文化自觉与文化认同,增强了全社会的民族自豪感。申报世界遗产的过程为世界遗产保护方面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最好的切入点和平台,给了世界进一步了解中国遗产保护相关工作的机会,也给国内遗产保护工作的完善和在国际社会形象的提升提供了舞台。申报工作要求世界遗产地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要求,遵循国际先进的遗产保护理念和科学具体的遗产管理标准,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环境的整

¹ 《2011年中国旅游景区发展报告》(国家旅游局)

治和舆论的宣传,在多方面的综合推动下提升全民的遗产保护意识和遗产利用水平。社会各界包括各地方政府和行政管理部门,各方面专家学者和社区居民在内,都对世界遗产的相关问题给予了广泛的关注和高度的重视,世界遗产旅游也从少部分人的旅游选择逐渐成为受到普遍欢迎的旅游活动,进而带动了世界遗产地的开发热潮,推动很多地方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大发展。在许多世界遗产地,旅游业已经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成为促进城市发展的重要驱动因素。

但是申报世界遗产对所在地城市也可能是一把双刃剑,除了前面所述的推动作用,也可能对城市带来负面影响。一是为了成功申报地方政府往往要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花费巨大的成本进行前期的准备工作,一旦失败会给地方发展带来沉重的包袱,即使能够成功也并不是每一项世界遗产都适合进行开发利用而为当地带来足够丰厚的经济回报。二是成功申报并开发的世界遗产同样会因为使用不当对遗产地城市带来很多负面影响,如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交通拥挤等(Wall, 1994; Garrod and FyaU, 2000)^[4]。世界遗产地政府对世界遗产的品牌效应及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深信不疑,这虽然激发各方力量掀起世界遗产旅游开发的热潮,但也忽视了世界遗产保护的重要性,没有处理好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出现了为了旅游而过度开发以及掠夺性经营的现象。很多世界遗产都因为过度发展或不当发展旅游而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比如2000年的“水洗三孔事件”、2003年武当山建筑群的“遇真宫电线短路失火化为灰烬”以及2002年武陵源修建“百龙天梯”等。可见,申报世界遗产成功后,如何实现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的协调发展是值得思考的关键问题。

(四) 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

从2011年我国人口城镇化率首次超过50%正式进入城市型社会已经过了5年,如今,人口城镇化率也进一步提升到54.77%,城市的健康发展问题对建设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的研究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研究的重要内容。

城市是自然界经过人类改造形成的聚居地,城市中大量分布着人类漫长历史文明发展过程中经过历朝历代的积淀而保存下来的遗存,这些遗产不仅是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结晶,更是城市的灵魂和文脉。城市的发展进程就像人的成长过程一样,会经历诞生、发展和消亡的各个历史阶段,很多有价值

的东西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无迹可寻,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作为世界遗产遗留并被保护了起来,成为城市历史的记录。这些遗产不仅包括反映不同时代风貌的各种不可移动的建筑文物,还包括埋葬于地下体现不同时期社会生活印迹的遗物或遗迹。作为城市发展独一无二的见证,世界遗产被认为是一个城市乃至城市所在的整个地区的代名词和重要的象征。随着我国居民收入的稳步提升和旅游消费观念的成熟,遗产地政府对遗产旅游发展更加倚重,遗产旅游市场日益壮大,这促使着遗产旅游产业链的深度延长、遗产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扩张和中国民间资本的扎堆投资热潮,都使得世界遗产旅游与遗产地城市之间的关系更加紧密。

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用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发达国家经历了200年甚至300年的时间才得以完成的城市发展历程和达到的城市化水平,在取得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等成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出现了房价过高、交通拥挤、环境污染和社会治安问题等一系列城市发展难题。特别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规模“旧城改造”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众多世界遗产地城市的原始面貌,破坏了世界遗产的完整性、整体性,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城市发展的功能趋同,城市文化出现特色危机,降低了世界遗产的价值和世界遗产地的吸引力,使一些世界遗产成为濒危遗产,也影响了世界遗产旅游的长期发展。反过来世界遗产旅游也反作用于世界遗产地城市,对其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当旅游者大量的涌入世界遗产地城市,再加上旅游者有意识或者是无意识的不当旅游行为,会对世界遗产资源产生一定程度的损毁,并对其依托的世界遗产地城市的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致使一些世界遗产地城市的原始状态已经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虽然世界遗产旅游与世界遗产地城市发展之间不乏这样那样的矛盾,但是绝不能把二者之间的关系理解为是相互对立的(吴必虎等,2002;杨锐,2002)。世界遗产旅游是发挥世界遗产经济功能、文化功能和教育功能的重要手段,可以有效促进世界遗产地城市的发展^[4]。2008年7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成立,并在揭牌仪式上通过了“关于建立亚太世界遗产论坛的倡议”草案将亚太世界遗产地可持续旅游列为讨论的主要成果^[5]。倡议草案认为,虽然世界遗产旅游给世界遗产地城市的管理带来了巨大压力,但是也应该继续保障与增加世界遗产旅游在未来的发展机会。由此可见世界遗产旅游在世界遗产地城市保护及发展

中的积极作用已经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因此,世界遗产旅游发展的适宜性、与世界遗产地城市的协调性成为目前讨论的热点,围绕这一问题进行的科学分析不仅对世界遗产地城市旅游发展,而且对世界遗产地城市的整体发展进程都具有重要意义。科学分析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是为了选择更合理的发展路径,达到引导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的目的。

二、研究目的与价值

(一) 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各种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相关问题的梳理和回顾,针对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的现状,研究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旅游学、地理学、经济学等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在科学界定“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内涵的基础上,对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相互作用机理进行分析,包括影响因素、程度和范围等,并通过构建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水平评价体系,定量测度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水平,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确定2000年以来我国地级行政单位世界遗产地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的程度,进而根据聚类分析结果总结世界遗产地旅游与城市发展的关系类型,最后提出不同关系模式下世界遗产地旅游与城市的发展模式与发展对策。

(二) 研究价值

(1) 学术价值

本书以世界遗产旅游为核心概念,分别探讨了世界遗产旅游与世界遗产地城市的涵义、特征、发展历程、现状及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丰富了旅游与城市关系的理论研究视角;结合耦合理论、协调度理论、发展理论研究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和耦合作用机理,解释了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之间的相互促进与约束关系,拓展了旅游与城市关系理论研究的深度;基于发展理论,分别从旅游发展规模、旅游发展速度和旅游发展效益三个维度和城市发展、城市社会发展、城市环境发展和城市文化发展四个维度构建了世界遗产旅游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的评价体系,是对以往旅游与城市发展评价研究的拓展与深入;结合探索性分析与检验性分析,论证了

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水平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合理性,明确了各个指标对世界遗产旅游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影响程度;基于耦合协调理论,利用耦合协调度为依据对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进行了类型划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不同类型的发展模式与优化对策,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与分析支撑。

(2) 应用价值

通过对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发展水平及关系的评价,从动态上分析中国世界遗产地旅游业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以及二者之间关系,探讨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的方向和路径。分解世界遗产旅游发展水平与城市发展水平的不同维度,可以发现旅游业与城市发展的薄弱环节,挖掘世界遗产地发展的潜力,从而为世界遗产地的发展指明方向。耦合协调度的分析有助于在正确认识世界遗产地不同协调水平的前提下,找到世界遗产旅游与城市协调发展的路径与机制,为世界遗产地旅游业转型升级与城市可持续发展相关政策的制定提供有针对性的参考和依据。了解世界遗产地旅游与城市发展水平的时间演变与空间差异,正确认识世界遗产地所处的发展阶段和空间环境,有助于推进区域间的竞争与合作,全面提升世界遗产地旅游与城市的发展水平与发展质量。

三、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我们在 Elsevier 电子期刊全文数据库期刊文献范围内,以“heritage”为关键词进行搜索,然后对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归类,其中涉及世界遗产旅游研究的文献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研究。

(1) 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

遗产旅游这一旅游类型最早出现在欧美等西方发达国家,围绕遗产旅游的研究也随之开展。一般认为,最早研究遗产旅游的是英国学者 Edwards,他在 1987 年发表了一篇关于英国遗产海岸旅游生态影响的调查研究,被认为是遗产旅游研究的开端^[5]。之后,学者们围绕遗产旅游的基本概念、遗产旅游者、遗产旅游开发与保护、遗产旅游影响等众多方面开展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见表 1-1)。

表 1-1 国外关于遗产旅游的研究成果

研究主题	主要研究人员
遗产旅游的概念与价值	Yale, 1991; Poria et al., 2001; Garrod and Fyall, 2001; Ashworth and Tunbridge, 2000; Halewood and Hannam, 2001; Chhabra et al., 2003; Porter, 2004; Spennemann, 2007; Kim, 2007; Kinghorn, 2008; Bowitz, 2009; Tuan, 2008; Sanna, 2008
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	Garrod and Fyall, 2000; Poria et al., 2001; Smith, 2003; Scantlebury, 2003; Russo et al., 2001; Mckercher et al., 2005; Fladmark, 1994; Seyed Koorosh Sarvarzadeh, Syed Zainol Abidin, 2012; Zerafinas binti Abu Hassan, 2014; Tutur Lussetyowati, 2015
遗产旅游者	Dalleñ, 1997; Terence, 1999; David, 2001; Yaniv, 2003; Ching-Fu, 2010
遗产旅游管理	Garrod, 2000; Brian, Alan Fyall, 2000; Orsi, 2013

① 遗产旅游的概念与价值。关于遗产旅游的概念,有两种主要的观点。Garrod Brian 等认为“遗产集中了我们所继承的一切,遗产旅游是指能从历史建筑物、艺术品或美丽的风景中得到的任何意义”^[7]。但 Poria Yaniv 认为这种观点会造成历史旅游与遗产旅游界限的混淆,容易引起相关管理的混乱,并认为遗产旅游的界定应该基于两个特征,一是旅游者的游览动机是受到遗产的吸引,二是旅游者感知到自己是遗产的一部分。根据 Poria Yaniv 的阐述遗产旅游者分为三种类型:认为遗产地与自己无关的游客、认为遗产是属于自己的游客和不知道这是遗产地的游客^[8]。之后 Garrod Brian 等又指出了 Poria Yaniv 所给出定义的缺陷,包括定义仅从遗产旅游者的视角考虑而无视了遗产旅游供给方的立场,定义基于容易受到市场营销等因素影响的遗产旅游者的感知等方面。

关于遗产旅游价值的研究包括遗产资源价值测度和遗产旅游价值评估两个方面。Porter(2004)提出用旅游成本和个体评估的方法研究遗产资源的价值^[9]。Spennemann(2007)已经把月球作为未来遗产研究其潜在的文物遗产价值^[10]。与之相比,遗产旅游价值的评估更具有实际意义,Kim(2007)和 Kinghorn(2008)都从游客的角度衡量了发展遗产旅游的经济效益^{[10][11]},Bowitz(2009)则从遗产旅游项目的角度研究了发展遗产旅游带来的经济效益^[12]。关于遗产旅游经济价值的评价方法,Tuan (2008)和 Sanna(2008)分别提出成本收益法和模糊数法等一些建模计算方法^{[13][14]}。

② 遗产的保护与旅游开发。保护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尤其对于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遗产资源来讲更为重要。文化遗产旅游有助于保护文化遗产,将旅游业与传统文化相联系,促进旅游经济的发展。Fladmark(1994)认为旅

游作为保护文化遗产的工具,文化遗产旅游的发展不仅具有识别、管理和保护遗产的价值,还对社区具有影响力、产生经济和社会效益、实现金融资源的供应以及旅游目的地的营销和推广^[15]。但在文化旅游资源的保护中,公民参与文化遗产问题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Seyed Koorosh Sarvarzadeh 和 Syed Zainol Abidin(2012)运用 SWOT 分析探究伊朗历史悠久古城的遗产计划,他们在研究中发现公民对正确保护文物的意识较为缺乏和城市管理过程中权力失衡^[17]。遗产旅游的开发对旅游经济的发展具有推动作用, Zerafinas binti Abu Hassan 等(2014)采用市场营销中重要的工具如 PESTEL 和 SWOT 对马六甲遗产旅游发展的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结果对实现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Tutur Lussetyowati (2015)揭示了巨港文化遗产旅游的潜力,并表明了旅游业在城市遗产保护中具有保护文化遗产和提高当地居民生活质量的作用^[19]。综上所述,国外学者对遗产旅游的研究旨在遗产的保护和旅游的可持续发展,尤其是旅游者和居民开发保护遗产的意识。

③ 遗产旅游者。Dallen(1997)研究了旅游与个人遗产体验的关系,讨论了四种遗产体验模式,认为个性化遗产旅游的研究存在广阔的潜在空间^[20]。Richard(1998)在工业遗产公园游客调查的基础上分析了游客的体验和收益需求的不同维度及其影响因素。以往研究把根据体验和收益需求定义的细分消费群体描述成与旅游动机和游客的社会经济状况有关,他对这种过分强调社会人口学分析的实用性的问题提出质疑并认为根据体验和收益细分的消费群体在一定程度上和社会经济状况不相关^[21]。Terence(1999)研究了游客在攀登位于澳大利亚中部名叫 Uluru 的山峰时不恰当的文化行为。他以到访世界遗产地区的旅游者为样本,应用理性行动理论作为一种方法论的框架,探讨游客的信念与目标相关的行为,得出了信念的强度与性别和攀爬行为相关的结论^[22]。David(2001)研究了文学遗产地、旅游和遗产体验之间的关系,文学遗产地因与作者及小说的背景密切相关而显得特别,成为吸引旅游者的遗产旅游景观。作者对文学遗产旅游者关注的焦点,得到满足的类型,是否是文学朝圣者,遗产真实性与保护的相关问题等进行了研究^[23]。Yaniv(2003)认为旅游者的认知是遗产旅游的核心,通过调查旅游者行为前、行为中和行为后在性格、遗产属性、感觉、认知四个变量上的变化,发现旅游者对遗产地的认知与旅游方式有关,特别是认为自己与遗产有一定联系的人与其他人的旅游行为不同,认为研究旅游者行为对遗产地管理具有重要意义^[24]。Ching-Fu(2010)以我国台湾省台南市 4 个主要遗产地的 447 名游客

为调查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技术研究了体验质量、感知价值、满意度和行为目的性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体验质量对感知价值和满意度有直接影响,但对行为目的没有直接影响,然而“体验质量→感知价值→满意度→行为意图”的关系似乎是显而易见的^[25]。

④ 遗产旅游管理。Garrod 等(2000)在对包括遗产拥有者、管理者以及相关学者问卷调查的基础上,讨论了入境游客的影响因素和遗产管理机构的主要作用等问题,研究了遗产旅游管理的制约因素和应采取的长期管理规则,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些问题在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评价中的重要性^[26]。Brian 和 Alan Fyall(2000)调查了遗产地管理的主要限制和相关政策问题并评估了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策略^[27]。《世界遗产报告》(2005~2006)指出了全球尤其是西欧地区遗产管理存在的诸多不足:管理机构对世界遗产及保护条例的理解偏差;对遗产缺乏系统识别、认识和整合;中央和地方管理机构之间权责不清;责任分散,缺乏协调等^[28]。Orsi(2013)提出了利用有地理标记的照片和地理信息技术的自然遗产景区旅游流评估方法,通过地理标记照片识别热点景区,并在此基础上构建检索点(如停车场、车站等)到热点景区的旅游流的重力模型,模型以旅游流的容量与景区知名度成正比,与旅游者旅行时间成反比为前提假设,并在 GIS 环境中通过景区实际访问量对假设进行检验^[29]。

(2) 关于“世界遗产”旅游研究。

以《世界遗产名录》中的各类遗产项目为研究对象,学者们对“世界遗产”旅游的各个方面都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Anne(1996)研究了世界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相关规划和政策问题,指出教育和调节是世界遗产旅游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30]。Jan 等(1996)认为遗产城市发展旅游在产生收益的同时也会带来损失,如果损失大于收益,就说明旅游业的发展不是可持续的,并通过对欧洲七个世界遗产城市的调查得出了旅游业威胁了当地的经济活力、遗产的完整性和居民的生活质量的结论,进一步提出了控制和引导旅游流的措施^[31]。Pretes(2002)对世界遗产城市 potosi 进行了实地调查,分析了遗产旅游的价值及游客与当地人的关系。Russo 研究了世界遗产旅游发展的“恶性循环”(vicious circle)现象,提出针对这一现象的关键点是要制定可持续发展的政策,并以威尼斯为例探讨了遗产城市中旅游产品的质量、地方的经济动力、旅游业空间组织中的关系等问题^[32]。澳大利亚学者 Michael(2002)通过实地调查,分析了该地开